

社会学在中国的复兴

——《现代中国社会学*·序》

张 琢

自1891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以“群学”之名开讲社会学以来，社会学在中国历尽坎坷，延续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了。

社会学最早以“群学”命名，取意于战国时期大思想家荀况（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298年——前238年之间）的《王制》篇。荀子（荀况的尊称）在这篇文章中简洁地阐述了生物有机体与非生命物质，动物与植物，人与禽兽三个层次的区别所在，从而抓住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类群体，分析了人类之所以能结成一定群体、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发挥群体结构的社会功能的原因。他写道：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①

王制就是帝王时代的政治，所以康有为把群学与“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际应用学”等课程并列为“经世之学”。^②如果说康有为的“群学”课至今我们还只能见到他的弟子梁启超留下的这个课表，那么严复在他的论文《原强》中便把他为什么要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译作《群学肄言》以及译介的目的说得明明白白了。他写道：“其书于达（尔文）氏之《物种起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并强调指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可见康、严所见是相通的，体现了下述三方面的意义：

一、证明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社会思想史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内容，这是中国社会学的内在的思想渊源；

二、中国近代的社会学的先驱从开始引进西方社会学之日起，就力图使其与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相衔接，以熔铸出中国化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三、西方社会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维新启蒙思想家引进来便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即用以变革中国的社会，以图中国之富强。

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英国工业革命，科学基础是实验科学

* 本书将于近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台湾师大书院分别用简体汉字和繁体汉字出版。

① 据王光谦《荀子》集解本。

② 梁启超《康南海传》，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三版刊行。

尤其是生物进化论，哲学基础是经验论，正好适应了中国维新志士们向西方学习，“经世致用”变法图强的需要。社会进化的观点和实证的精神，对克服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士大夫的玄虚飘渺的陈腐学风起到了革新作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20世纪初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学者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最早引进者，也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中国人。1902年起，梁启超就在他办的《新民丛报》上介绍了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学说。接着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刊登了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当时各刊译介的重点都是《宣言》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资产者和无产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导力量“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以及社会主义学说。1908年刘师培、何震在他们创办的《天义报》上还刊登了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节译。

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在传授西方社会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1916年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教授登上大学社会学讲台以前，中国的社会学教育主要是由西方学者在教会学校进行的。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目的，但毕竟原原本本地把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搬到中国来了，同时西方国家还吸收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去学习社会学。这样，在国内外造就出了中国第一批社会学专门人材，至少这方面的客观效果不能抹杀。

1919年“五四”运动后，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和分化，学术带上了更强烈的政治功利的色彩。在社会学方面，出现了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以社会改良为主要的共同特征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多元发展的局面。并且，都开始以各自的理论为指导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分析和调查，这样就导向了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走向深入、富有成果的时期。关于这一段历史孙本文的《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年）及近年大陆出版的两本《中国社会学史》均作了重点介绍，此不赘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大事件和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学说为指导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以下中国社会学专指中国大陆的社会学未包括港、台）者们同其他各学科的学者一样，本来都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大显身手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好机会。可是，由于苏联“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接受了苏联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斯大林、日丹诺夫笼统地将社会学说成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加以摒弃、以历史唯物主义取代社会学的错误论断和做法，1952年，在中国大陆竟取消了社会学这样一门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学科独立存在的资格，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研究机构均被撤消。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主观武断地“取消”，但是社会生活本身并未停止，客观的社会存在、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无法取消的，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正确的做法只能正视社会现实，正视矛盾，正视问题，去进行科学分析，并因势利导加以正确、妥善的解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矛盾的学说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事实上，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调查、分析和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只是没有以社会学的名义，而是在哲学、政治及其他社会科学名义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大陆，社会学在这一时期（1952—1978年）是名亡实存——虽然，由于极“左”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严重影响，理论与实践被大大扭曲，牺牲了调查

与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留下了许多痛苦的教训。然而，这些痛苦的教训恰又正是中国大陆社会学重新崛起的宝贵财富和反推力。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笼统地把社会学称之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加以摒弃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存在，同样都是有害于社会学全面发展的偏狭观点。

1979年，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以解放思想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契机，恢复重建后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节节上长。这首先是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发展动力；二是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社会学学科的复兴所做的开道工作；三是一批具有不同程度的其他学科的基础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中青年学者转向社会学，通过速成学习，形成了社会学恢复初期的骨干队伍，较快地见了成效，从而弥补了一些过去耽误的时期里的损失；四是得益于开放的条件，国际社会学界的热情友好的支持、协助和学术交流。

不过，与此同时，相应也使重建后的中国大陆的社会学队伍和他们提供的成品具有其恢复重建初期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老一辈社会学家，多遭磨难，专业被搁置27年后重新上马，便不能不受到年龄和知识两方面的老化和力量单薄的局限，重新开放后，放眼世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对国际同行这一时期的长足进展，不能不有隔世之感，中青年学者从别的专业或实际工作部门转到社会学队伍中来，固然带有各原学科的专长，能产生多种学科直接杂交的复合结构的优点（这一点对于综合性很强的社会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人说，这也许会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特质，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这些人还来不及进行严格扎实的社会学专业的培养训练，就要边干边学参加教学、调研甚至著书立说的急行军，难免出现杂乱、肤浅乃至乱贴“××社会学”的标签的现象，幸好这种现象已引起及时注意，并在近年已有所改变，科学化与学科化都在与日俱进；还有，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在的实际，对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也不认真学习，生吞活剥、照办照抄外国社会学的结论和方法的倾向，在一部分青年学者中相当突出，这也须得在中国社会学和这些青年学者自身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去克服。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经过这十年的“编织”，已逐渐显露出了一个模糊的雏形，无论它怎样的不成熟，业已在中国的科学园地上立住脚了。现在中国大陆已拥有近百个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各种社会学会、社会学系和教研室、社会学研究所和研究室等）、千余名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四万多名社会学的学员（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函授生），在国内外大学新培养出来的取得了社会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新生力量正成批充实到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和实际部门的社会工作岗位上去，预示着中国社会学明天的希望。十年来，尤其近几年已出版了上千部社会学或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著作和通俗读物，这里面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也有百余种，其中包括纳入国家“六五”社会科学计划的八个社会学和青年问题重点研究项目的终期成果和“七五”国家十三个社会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由于社会学学科化（专业化）程度尚低，有相当多的著作和文章；还处于似是而非和似非若是的“准社会学”状态，外延模糊，因此很难精确统计社会学著作和更大量的文章的数量。另外，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单位还先后创办了十来种社会学研究、教学和普及性刊物，其中刊登的有些优秀论文已引起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视。

为了积累成果，及时总结经验，克服缺点，使中国社会学在下一阶段和长远的未来得到

健康的发展，同时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一部较为系统的参考资料，为国内外关心中国社会学的同仁和朋友们提供一个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概观，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当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这是一本在尽可能汇集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分门别类进行综合分析写出的史论结合的述评性、历史性的著作。

由于社会学领域极为宽泛，据有人统计，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已多达数百种。在中国许多还是空白，有些学科（甚至是很重要的学科，如农村社会学）或尚处在襁褓之中，或仅刚刚起步；还有些分支学科星星点点，已有人在那里披荆开拓，但尚未见显绩，本书都暂且不论，以待来年收获的时候。这里，仅就在我们看来比较重要、比较“热门”、资料也比较丰厚、大体已有个眉目的一些方面加以整理，编写了此书。还有些属于社会学领域的重大问题，如人口和青年的研究，由于在中国这两个方面的数量的异常庞大和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受到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特殊重视，有关研究和工作部门已自成体系，这方面的统计和研究成果，报刊、书籍所载很多，本书篇幅难以全面概括，其中关于人口问题和青年问题方面的实证研究我们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分专章论述，本书也未纳入，仅此说明。

本书是在统一学术设计规范下，由各章撰稿者从其掌握的有关方面的资料的实际出发写成的。各章大体上都包括了各有关方面恢复的历史过程、机构的建设、人员的培训、调查和研究的主要课题与主要成果、有关领域讨论的主要学术问题及代表性观点。各章都注意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述评尽可能客观、公允，但是由于各分支学科的性质、特点不同，发展也不平衡，有的偏重理论，有的偏重应用，各章撰稿者各有自己的见解和风格，所以，各章在基本结构大体一致的情况下，也尽可能保留了各章撰写的特色，使全书不至于太刻板。

全书共十个单元。章目和撰稿人如下：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琢撰稿；第一章中国大陆社会学的复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育民、王颢、方明撰稿；第二章理论与方法的更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宛丽撰稿；第三章社区的调查与研究，由王颢撰稿；第四章阶级阶层结构研究，由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庞树奇、仇立平撰稿；第五章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由张琢撰稿；第六章社会心理学的引进与运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石秀印、华夏出版社刘卫平撰稿；第七章家庭与婚姻的调查与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马有才撰稿；第八章社会保障改革的探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力之撰稿，书末还附有王育民编写的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大事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雪萍编辑的十年中国社会学主要著作目录。

各章的述评和书后所附的成果目录及大事记，均系编撰者一己所见，没有也不可能详尽，若有重大遗漏和错误，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在有机会时补过。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在进向下一个十年时，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更希望已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社会学在下一个百年能繁荣、成长为国际社会学之林的一株参天大树。

1989年6月于北京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唐军